

论诸葛亮钟情汉中的人性真实

李 锐

摘 要 诸葛亮对汉中可谓情有独钟。本文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对诸葛亮的文化价值人格、现实人格和人文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指出汉中独特的自然地理、民情习俗成为这种人格和精神的承载体。这是文化的真实、哲学的真实、人性的真实。

关键词 诸葛亮 文化心理 阐释 人文地理学 人性真实

诸葛亮对汉中可谓情有独钟。刘备三顾茅庐时,他称益州、汉中“民殷国富”,为“建基业”之所。刘备夺取汉中后,他又颇费苦心地劝谏刘备称汉中王。刘备死后,他作为丞相、知内外事的大都督,亲率大兵 30 万,出屯汉中,开府办事。六出祁山伐魏,不幸染病于五丈原,在死神将临之际,他依然魂牵梦萦汉中,遗命葬定军山。

海德格尔认为:“地方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存在的外部限定和其自由与现实的深度。”^①据此,我以为诸葛亮与汉中的这种深情绝非偶然形成。本文将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阐释。

诸葛亮所以对汉中情有独钟,首先是因为汉中体现了他内心极本真的文化价值人格。

诸葛亮曾在南阳隆中隐居到 27 岁,出山后南征北战死于五丈原也正是 27 年。这一半对一半的生命历程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诸葛亮在他前 27 年的隐居生活环境中,逐步地形成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基本人格价值定向。这种价值人格的形成,来自于诸葛亮对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乱现实的清醒认识、对于政治阴谋和倾诈的畏惧、对于个体命运的忧虑。据徐庶称,诸葛亮“尝好为《梁父吟》。”《梁父吟》的内容是“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垒垒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②诸葛亮吟《梁父吟》显示出他的思考与生存选择:拯救乱世必然跻身于政治,政治的倾诈必然危及个人的生存。从个人的生存考虑,与其战战兢兢入世,倒不如潇洒自在出世;与其入庙堂遭人暗算,倒不如入山林保身全命。于是,他交接水镜先生、崔州平等入,身披鹤氅,啸聚山林,或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躬耕于陇亩之上,或寄情于琴瑟,或放声于诗书。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这种高蹈而空灵的价值人格,是先秦以来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深层的“情结”。从老子庄子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发现了宇宙的浩大无限与个体的渺小有限。宇宙天地的浩大无限是必然的和难以改变的,那么个体面对此等无奈,便只能把目光转向个体自身,便只能不断地、艰难地、执着地放弃所有的功名利禄的追求,便只能浪迹山林,超拔去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③寻求精神上的自由。身处建安乱世的诸葛亮,以极清醒的目光,注视着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现实而又无可奈何,选择隆中隐居便也是极自然的了。

然而,诸葛亮是个面情极软而自尊心极重的人。当刘备以学生的姿态,卑躬屈膝地三顾茅庐之后,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被人任用却没有令人屈辱的考验,有的只是用人者备上厚礼、殷殷恳请、言听计从,这太令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自豪了!于是,诸葛亮违背初衷地入世冒险去了,走上了“士为知

己者死”的路子。

问题在于,诸葛亮入世冒险、寄身庙堂的选择是否与原有的出世逍遥、浪迹山林的人格价值定向发生了断裂?由于陈寿《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官修史书,对于诸葛亮主要记载的是出山后27年的政绩,因而必然会留下一段空白。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作为“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小说,却热衷于铺陈英雄们在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智慧和活动,而忽略了诸葛亮内在价值人格的连续性,这就令人感觉到不安和遗憾了。无怪乎一位西方汉学家在研究诸葛亮时,就提出了“卧隆苟全终不得,常使来者惑满心”的质疑^④。

按照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特尔的人格心理实验和调查,一个人从25岁开始,基本人格就成熟了,并且很少改变^⑤。据此,诸葛亮前27年所形成的基本人格价值定向是不能因出山入世的新选择而发生断裂的,至少要形成一种互补的心理格局。

笔者认为,只有从诸葛亮对汉中情有独钟的人文地理研究入手,才能补上史书中的空白,去掉小说留下的遗憾。在汉代,汉中这块地方的风土人情是:“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业伐山为业,果蔬赢蛤食物常足,故芻麻孳生而无积聚,饮食粗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信巫鬼、重祭祀与巴蜀俗同。”^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诸葛亮未到汉中以前的统治者张鲁,利用汉中风淳厚的特点,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以五斗米道的“祭酒”代替衙门的“长官”,以宗教的“师君”代替行政的“首长”。张鲁使汉中人多脉脉温情的人伦和谐,少了尔虞我诈的官场弊端;多了善举,少了恶行;多了纯朴,少了刁钻。这一切,不能不给占据汉中的诸葛亮以巨大的心灵震撼!因为汉中最合乎他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基本价值人格定向,最合乎他的“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的生存理想。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蜀国的一些反常做法。例如,刘备已占据益州,接着又北定了汉中,此时诸葛亮却怂恿堂堂益州牧去做小小汉中王。汉中无论是地域还是人口和财富,可都是无法与益州相比的呀!诸葛亮此举除了给刘备“正名”的表层原因外,难道真得就没有包藏着个人对汉中的偏爱么?再如,诸葛亮做了蜀国的丞相并领益州牧,却长达8年出屯汉中并开府办事。从大局看,此举是为了北伐,但从诸葛亮个人文化心理上看,难道就没有避开朝廷纷争、寻求心理宁静的成分么?

如果说上述的分析尚属推论,那么诸葛亮选择汉中定军山作为自己亡故后的墓地,则实实在在地显示出汉中是他基本人格价值定向的对象物。海德格尔在分析人的生存心理现实时指出:“在有所领会地向死这种最本己的可能性存在之际,本己的能在就成为本真的和通体透彻的。”^⑦简言之,当一个人感觉到即将要死时,他就会坦露出最本真的生存理想(能在),显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和真实想法。诸葛亮在后27年中,出将入相,南征北战,为蜀国立下了大功劳。但在五丈原临终之际,他没有想安葬在成都,显示拯时济世的荣耀,以示永垂不朽,而是想葬在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⑧,与青山为伴,与汉中民风相融,真正地显示自己的本来人格价值定向。这是诸葛亮临终时因超脱了现实而呈现出来的一种内心的自由和解放!这也是一种落叶归根,但这个根不是人伦血亲关系之根,而是一种本真的文化价值人格之根!无怪乎汉中立诸葛亮如此的魂牵梦萦。

二

诸葛亮所以对汉中情有独钟,其次还因为汉中昭示着他的社会业绩,是他社会价值实现的地方。

诸葛亮后27年的人格突变,与刘备求贤的谦卑态度有关。卡尔·霍夫兰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已经发现:“信息传递者的信誉、专业水平和地位越高,吸引力越强,就越有可能赢得听众的态度改变。……重复和新奇一般都利于改变。”^⑨刘备是皇叔,在人们心目中是极有贤德的英雄。当他以三顾茅庐的重复频率、以学生拜师的新奇形式,邀请诸葛亮出山时,诸葛亮内心中另一种人格价值被唤醒了。这种人格价值便是先秦以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更需要指出的是,刘备的殷殷三顾又恰当地满足了诸葛亮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形成了没有令人屈辱的无休止的来自上位者的考验考察,只有出自下位者以待慢慢傲慢之姿反过来对居上位者的考验考察的特殊情景,而这又促使了他的态度转变。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人的尊重需求得到满足,不仅会导致“各种价值等级会相应的变化”,而且会产生一种“新的价值强度”^⑩,更重要的是,会直接地进入更高级的心理需要级次,产生自我实现的欲望^⑪。于是,诸葛亮就只能告诉其弟“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就只能“士为知己者死”地入世,就只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地义无反顾,而别无他择!

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到“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为了群体得到拯救而暂时压抑下个体的人格价值追求。在后27年里,他把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放在了头等重要位置。为此,他向刘备道出了三分天下的战略构想。我以为,在诸葛亮一开始的三分天下的战略构想中,他就把益州和汉中视之为自我价值实现之所,对二地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北方已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占领,是“诚不可与争锋”之地。江东已为“历三世不衰”的孙权所占据,是“可为援而不

可图”的地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应该争夺的“用武之地”。而益州和汉中，他则认为“民殷国富”，是基业之所，应该取刘璋和张鲁而代之。在诸葛亮后来的政治军事实践中，他对汉中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而对其他地方的兴趣渐次淡漠。例如，诸葛亮在荆州以放火著称，火烧新野、火烧赤壁，毫不怜惜；到关羽失荆州，诸葛亮也不像刘备那样惊慌痛苦，反倒在劝刘备登基做皇帝方面不遗余力。这固然是军事政治的需要，但也潜藏着他的淡漠。他内心确实没有把荆州视为自我实现的处所。再如，诸葛亮对关中以恐吓闻名，北伐时总是在陇西天水一带用兵，而魏延所献东出子午谷直捣长安城的奇计一再遭到贬斥。这固然显示出他的谨慎，但也不能说与他的人文地理观念毫无联系。他内心确实没有把长安视为自己施展才能之地。再如，曹操征汉中时，畏惧地称汉中为“天狱”，占领汉中后，又视之为弃之可惜食之无肉的“鸡肋”。而诸葛亮则恰恰相反，对汉中投入了巨大热情，带领30万大军出屯汉中，开府办事，农垦屯田，造木牛流马，创连弩弓箭，西筑汉城，东筑乐城，全力保守着这方乐土。他晚年时，甚至对大后方益州的兴趣也减弱了。他深切地体会到，随着政权的巩固，朝廷必然会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漩涡，无端地耗费自己的斗志和生命，所以他宁可出屯汉中，直面魏国，以保持自己的旺盛斗志。从《出师表》对后主的谆谆告诫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诸葛亮的这种心态：“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从人文角度看，地方本来就是人的经验与自然位置结合的产物。诸葛亮对汉中有独钟，且把汉中视为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处所，必然与汉中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汉中的自然地理状况是：背倚秦岭，面对巴山，汉水中贯，群山环抱，东达荆襄，西控天水，南蔽益州，北瞰雍州，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加之汉中盆地皆良田沃土，盛产稻黍，不忧冻饿；这便使汉中成为极好的屯兵安民之所。汉中的自然地理与诸葛亮自我实现的价值人格正好契合：北瞰雍州，无异于时刻提醒着他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积极进取；南蔽益州，无异于给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蜀国提供了可靠的安全屏障；不忧冻饿，无异于给他的北伐准备了一个大粮仓；可攻可守，无异于给他的军事活动提供了战略战术上的极大便利。于是，他出屯汉中后，发挥了他最大的能量，甚至创造了许多奇迹。他立法施度，取得“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的明显效果^⑫；他严于律己，教人随时提出他的过失，并公布于天下，顺利地渡过了街亭兵败后的艰难岁月；他勤于思考，发明了山地运输工具木牛流马，设计出了连弩弓，创造了军事科技的辉煌。汉中实实在在地成了诸葛亮自我价值实现的地方，诸葛亮也赢得了汉中人民的尊敬和爱戴：“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⑬这不能不成为诸葛亮钟情于汉中的又一个原因。

三

诸葛亮所以对汉中有独钟，最后还因为汉中体现着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文精神。

按照诸葛亮隆中构想，完成三分天下，就算达到了目的，实现了价值。可是一旦投身于这场军事政治的斗争，他才感觉到再也不能从这艘战船上下去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指出：“一个政治家，他驾驶集体权力这条航船通过未曾探明的水域（在这些水域，集体制定的一般规划已不适用甚至语焉不详），这时他就会在自己作为准则观念的人格工具时，体验到命运的份量。”^⑭诸葛亮发现，占据了汉中和益州，平定了南诏，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并不能安享太平。曹魏、孙吴虎视眈眈，而蜀国相比之下，力量又最弱小，“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⑮他意识到，敌强我弱，“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⑯他在《后出师表》中，从六个方面提出不北伐就会灭亡的意见，表达自己的焦虑。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诸葛亮内心确实感受到了命运的份量：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之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逆睹也。^⑰

问题在于，诸葛亮似乎已经感觉到这种冒险注定要失败，并且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态甚至已流露出这种失败的感觉，但是他还要倾其所有，以个人的性命为赌注，以整个蜀国为赌注，出师伐魏。这就不简单的军事政治问题了。屯兵汉中，六出祁山，明明不知结果，还苦争苦斗，明明难以自主，还要听任命运摆布，这已包含了一种哲学意味：诸葛亮要显示出某种挑战的勇气，要显示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志，要显示出“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

汉中是蜀的北大门，它那独特的政治地理位置和独特的风土人情，牢牢地记挂在诸葛亮心头。如前所说，汉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有纯朴的民众做基础，有良田沃土提供军需，有崇山峻岭阻塞敌骑，出兵北伐是后勤基地，休养整顿又能习兵演武。汉中理所当然地又成为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天

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的载体。于是，晚年的诸葛亮在汉中又上演一出励精图治的活剧来。他在古阳平关认真读书，苦苦思索，运筹帷幄；他在古黄沙镇耐心指导，以他的智慧造出木牛流马，解决崇山峻岭搬运粮草的难题；他在古定军山下教兵讲武，传授军事智慧，提高蜀军的军事素质和作战水平。汉中现存的那一个个三国文化景观，如古阳平关、古定军山、诸葛亮读书台、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教兵讲武处、休士劝农处等等，没有哪一处不昭示着诸葛亮那挑战的勇气、顽强的意志和进取的精神！

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和“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通过汉中的三国文化景观被保留下来了。许多文人骚客到汉中后，都深深地被这种精神所打动。宋代陆游在参观了诸葛亮读书台后写到：“松风想象梁父吟，尚忆幡然答三顾。出师二表千载元，远比管乐盖有余。世上俗儒宁辨此，高台当日读何书？”^①陆游从诸葛亮的高台读书联想到前后两个《出师表》，准确地把握到了诸葛亮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和“千载元”的永恒价值。至于诗中否定诸葛亮前27年的基本人格价值的讨论，那与他眼目下只看到诸葛亮晚年的活动旧址有关，与陆游本人的拯时济世的人格价值有关，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明朝郭鼎藩在游览了汉中的武侯祠后写到：“飞花衬碣犹涵露，古树当帆半吐云。报主曾云惟有死，至今血泪动千军。”^②郭氏在武侯祠较为系统地浏览了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因而他的体验可以说最准确最深入。他甚至已触摸到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命运和敢于向命运挑战的悲剧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旁观者和后来者所感受到诸葛亮的悲剧精神，对当时的诸葛亮本人来说，则在内心唤起的是是一种幸福感。在以人为本主义心理学看来，幸福不幸福并不在于生活是否舒适、快乐和拥有足够的物质，而在于是否能够朝着有意义的目标而进行的艰苦奋斗，是否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前者满足的是快乐原则，但快乐过后依然是虚无；后者满足的是幸福原则，奋斗过后留下的是充实^③。蜀国是小国，汉中是小州，要以此抗衡强大的魏国，诸葛亮必须拼上老命，惨淡经营。压力、劳累、疲惫，都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汉中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财物人口，都给他提供了充分的用武之地；远离朝廷以及与刘禅的特殊君臣关系，又给他提供了主宰军国大事的政治条件；这样，他的社会人格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他的内心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满足也是必然的。汉中能使诸葛亮的内心中感觉到幸福，那么他肯定会十分喜爱汉中，这便是诸葛亮钟情于汉中的又一个原因。

总之，汉中作为三国名胜地，是诸葛亮的人性与伦理与汉中独特的自然地理、民情习俗结合的产物。如果说以诸葛亮为研究中心可以看到汉中的文化特点的话，那么以汉中为研究中心则又能认识到诸葛亮的文化心理特征。这是文化的真实、哲学的真实、人性的真实！

注释：

① M·Heidegger 1958: The Question of Being. New Have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ress.

② 《乐府诗集》卷41、《艺文类聚》卷19均有载。

③ 嵇康《赠秀才入军第十四》。

④ 参见《台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选》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 《人格心理学》第10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⑥ 班固《汉书·地理志》。

⑦ 《存在与时间》第365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⑧ 陈寿《三国志》第92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⑨ 《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第343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⑩ 施普兰格尔《价值的等级》，见《人的潜能和价值》第19页，华夏出版社1982年版。

⑪ 马斯洛《人的动机理论》，见《人的潜能和价值》第168页。

⑫ 陈寿《三国志》第930页。

⑬ 陈寿《三国志》第931页。

⑭ 《人的潜能和价值》第35页。

⑮ 陈寿《三国志》第919页。

⑯ 陈寿《三国志》第923页。

⑰ 陈寿《三国志》第924页。

⑱ 转引自《汉中地区名胜古迹》第148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⑲ 《汉中地区名胜古迹》第145页。

⑳ 参阅加德纳《幸福、献身和意义》，收入《人的潜能和价值》第411页。